

沙
灵
娜
注
释

樵歌注



樵歌注

〔宋〕朱敦儒 原著

沙灵娜 注释

陈振寰 审订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黄涤明 李万寿
封面设计 孙晓云
封面题字 陈振寰

樵歌注

沙灵娜 注释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960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150千字

印数1—2,45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15·549 定价: 1.45 元

前 言

朱敦儒，字希真，是北宋、南宋之交的一位比较重要的爱国词人。他写过不少诗文和词，又曾创制了见于著录的最早的词韵《应制词韵十六条》^①。可惜诗文、词韵都已亡佚，仅有词集《樵歌》三卷传世。

由于朱敦儒既非朝廷重臣，诗文又多佚，因而史传述其生平十分简略，见于正史的材料仅《宋史》本传数百字。

朱敦儒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正月十三(或十四)日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②。青少年时代，他基本上过着诗酒风流的侠少生活。他以隐居不仕表示自己的清高，加上诗文又很出色，得到时人的赞许，以至“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中，为有权势者所举荐，他被“召至京师，将处以学官”。敦儒却以“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为理由，“固辞。还山”^③。

1127年北宋覆亡，吏民大批南逃，敦儒也开始了“万里飘零南越”的流亡生活。他自洛阳经淮西、金陵、江西，“南走炎荒”，辗转逃到两广，暂居于粤西泂州一带^④。

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及绍兴三年，朝廷曾两次征

召敦儒。在饱经国破家亡的乱离之后，敦儒也幡然改变了南渡前隐居邀名的生活态度，想要有所作为，甚至想为“王者师”。于是应召到了临安，“命对便殿，议论明畅，赐进士出身，任秘书省正字”，开始了仕宦生活^⑤。此后，他曾历任兵部郎中、临安府通判、两浙东路提点刑狱等^⑥。然而，南宋小朝廷执行着屈辱求和的投降主义国策，作为中下级官吏的敦儒，非但不可能有所作为，反而在绍兴十六年被右谏议大夫汪勃弹劾罢官，罪名是“专立异论”并与抗金派大臣李光相“交通”。敦儒罢官以后，于绍兴十九年退居浙江嘉兴^⑦。

绍兴二十五年冬，独揽朝政十九年的奸相秦桧在病危之时忽然想起卓有文名的朱敦儒，想让他教自己的子孙作诗，因此强使他出任鸿胪少卿。敦儒被迫就任，这固然表现了他的软弱性，但当时他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没有力量违抗权倾天下的秦桧，又怕抗命会给一家老小招来祸患。鸿胪少卿不过是个六品闲官，只司祭祀朝会，挂个空名罢了。敦儒从应召到被罢，前后只有十八天（绍兴二十五年十月初六至二十三日），并没有任何劣迹。统观敦儒一生，他从不曾谄事权贵，全部词作没有一首是献给达官贵人的^⑧。

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正月二十九日，敦儒死于嘉兴，享年七十八岁^⑨。

朱敦儒《樵歌》共二百四十六首，内容和风格都是丰富多采的。他的词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南渡前（公元1126年以前）；中期——避乱南

渡到致仕(公元1127—1145年);晚期——致仕以后(公元1146—1159年)。

敦儒早期词作留存较少,基本内容有三个方面:一部分歌咏飘逸不羁的布衣生活,被前人评为“最脍炙人口”的《鹧鸪天》(我是清都山水郎)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字里行间浸透了蔑视功名富贵的狷傲精神。另一些作品表现了敦儒作为风流才子的生活情趣,色调比较浓艳,可以《满庭芳》(花满金盆)、《菩萨蛮》(风流才子倾城色)等为代表。还有一部分作品是抒写相思别离的,风格仍不脱绮丽二字。总之,敦儒早期词内容未离“词为艳科”的藩篱,思想性不强,艺术上也还没有形成独立的风格。

敦儒词的主要成就是在中期。靖康之变,使国家民族遭受了惨重的灾难,南渡后的宋廷又苟且偏安、不图复土;政治黑暗,生民涂炭,国家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朱敦儒亲历乱离的痛苦,饱尝生活的艰辛,思想感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词作的内容和风格也随之大大改变,有许多篇章伤时忧国,表现出沉郁苍凉的特色。

在避乱南行途中,敦儒置身于苦难的流民之中,不断长歌当哭,抒写离乡去国的悲愁。他把自己比作失群的孤雁,如《忆秦娥》(吴船窄)、《采桑子》(扁舟去作江南客);比作孤云、转蓬与飘萍,如《采桑子》(扁舟去作江南客)、《忆秦娥》(吴船窄)、《醉落魄》(海山叠翠)。他眼中所见的一景一物都带着凄苦的色调,如“碧山相映汀洲冷”[《采桑子》(扁舟去作江南客)]、“惨黯

蛮溪鬼峒寒”〔《卜算子》(山晓鹧鸪啼)〕、“肠断红蕉花晚，水西流”〔《沙塞子》(万里飘零南越)〕。敦儒悲愁的情怀与异乡的凄凉景色交织成了流亡者的哀歌。这不仅表现了敦儒个人的痛苦，同时也反映了千百万遭受苦难的人民的痛苦，是他那个特定时代的声音，正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

在避乱期间，敦儒时常追怀故国的欢乐生活，以之反衬眼前的飘泊无依，更加突出了家国兴亡的深哀巨痛。例如《雨中花》(岭南作)，他追忆说：“故国当年得意，射麋上苑，走马长楸。对葱葱佳气，赤县神州。好景何曾虚过，胜友是处相留”。而今却是“胡尘卷地，南走炎荒”，于是，他长叹道：“此生老矣，除非春梦，重到东周。”从这样的词章可以看到敦儒的悲欢与国家的命运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南渡后的许多爱国词人常常采用这种今昔对比的手法表现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如李清照的《永遇乐》(落日镞金)张元干的《兰陵王》(春恨——卷珠箔)等。比较起来，敦儒的这类词章，兴亡之感显得特别鲜明、深切。可以说，对故国的怀恋之情贯穿于敦儒南渡后的全部生活历程。他有许多深情感人的词句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例如“万里东风，国破山河落照红”〔《减字木兰花》(听琵琶——刘郎已老)〕、“甚处是长安路，水连空，山锁暮云”〔《恋绣衾》(木落江南感未平)〕、“独倚危楼，无限伤心处，故国山河，一阵黄梅雨”〔《苏幕遮》(酒台空)〕等。他还写了不少思念留在家乡永远不能再聚首的爱人的恋情词，这种相思之情也总是与故国的风物、生活联系在一起

的。他把思亲同怀土融合在一起，感情显得特别深长。“一双新泪眼，千里旧关山”〔《临江仙》（几日春愁无意绪）〕就是很为人称道的、将家国之慨织入相思之情的名句。敦儒对乡土的爱是那样执著，无论是游春、赏秋，故国之思都会猛然袭上心头，使他“逢花倒躲，遇酒坚辞”〔《苏武慢》（枕海山横）〕；在山河破碎的情况下，他没有任何欢乐，他说，“除奉天威，扫平狂虏，整顿乾坤都了”〔《苏武慢》（枕海山横）〕，才能真正地游乐。这样的思想境界，与辛弃疾《水龙吟》（为韩南涧尚书寿）“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应该说是一致的。

敦儒中期词作，还有对被俘北去的徽、钦二帝的伤悼，如《临江仙》（直自凤凰城破后）；有对统治者不能任用贤能以图恢复的怨愤，如《水龙吟》（放船千里凌波去）；还有对朝廷上下宴安江左酣歌醉舞的不满和批判、讽刺，如《鹧鸪天》（唱得黎园绝代声）、《鹧鸪天》（极目江湖水漫云）、《风流子》（西湖画船轻泛水）等。

敦儒爱国词章的感情大都表现得十分沉痛。他多用悲、愁、恨、泪等字眼，又多以暮春、寒秋为背景，情调沉郁苍凉。但我们不能因此说敦儒的态度是消极的，感情是不健康的。别林斯基说：“凡是由于忧郁地观察世界，由于思念世间社会的痛苦而兴发的作品，都必崇高而可敬。在巨大的社会疾苦所引起的深刻忧伤的重负下，甚至呈现萎靡都可以被原谅。”^⑩敦儒中期的许多词章正是在当时“巨大的社会疾苦所引起的深刻忧伤的重负下”，“由于思念世间和社会的痛苦而

兴发的”，因此曲调也必然是沉郁苍凉的。敦儒同时代许多词人所表现的爱国感情，愤激昂扬的只是少数篇章，大多数作品满含着沉郁凄婉的情绪，这是时代使然。恩格斯谈到十世纪在英国征服者压迫下的爱尔兰人的民歌时说：“这些歌曲大部分充满着深沉的忧郁，这种忧郁直到今天也还是民族情绪的表现。”^⑩敦儒“忧时念乱，忠愤之致，触感而生”（王鹏运评朱敦儒语），他的爱国词章中的深沉忧郁，也正是民族情绪的表现。

敦儒晚年被迫致仕后，隐居嘉兴放鹤洲。思想渐趋消极，歌咏随缘自适，及时行乐和养生之道成为作品的主要内容，作品的情调趋于闲远恬淡，六首《好事近》（渔父词）是这类风格的代表作。但是，敦儒晚期词也并非一味“飘飘然”，仍有一些作品抒发不平的感慨，如《忆帝京》（元来老子曾垂教）、《减字木兰花》（无人惜我）等。敦儒也并未忘记世事，对于国事的忧虑、个人有志难伸的压抑之慨，还不时冲击着他表面风恬浪静的心海，而蓦地掀起波澜。如他的《诉衷情》（老人无复少年欢）写道：“悲故国，念尘寰，事难言。下了纸张，曳上青毡，一任霜寒。”词中表现的思想就是中期忧国之情的延续。

朱敦儒词的风格丰富多样（早期绮丽、中期沉郁、晚期闲旷），词的语言明白晓畅。我们不准备全面分析敦儒词的艺术特色和写作技巧，只想就它的某些特点作一些简单的介绍。

借物言志是敦儒常用的手法，他的咏物词有自己

独具的特色。他最爱咏梅，他把梅花作为自我的象征，寄入自己的气质、个性、感情以至身世遭遇。敦儒笔下的梅花不仅表现为孤傲高洁，还常常被描写成一位怀抱着诚挚的用世精神而不为人所理解的幽怨的美人，形象特别动人。例如在《蓦山溪》（西真姐妹）中，敦儒把梅花比作乘醉下凡的瑶池仙女：“冰姿素艳，无意压群芳。独自笑，有时愁，一点心难寄。”这一点难寄之心，正是诗人的忧世之心；《减字木兰花》（今正梅晚），又把梅花比作“低鬟掩袂，愁寄玉阑金井外”的深情少女，她“不肯人间取次开”，“独抱深心一点酸。”这深心中的一点“酸”，显然指的是《尚书·说命》中所说的和羹之心，敦儒是借以表达自己想要辅佐明主，力求复国的志向^④。然而世乱政昏，此心此志没人能够理解，他——高洁的梅花，只能“独自风流独自香”，而与明月相伴〔《卜算子》（古涧一枝梅）〕。在《念奴娇》（梅词）中，敦儒寄托身世的寓意更为明白，这首词上片通过诗人与梅花的问答，揭示了诗人的内心矛盾，表现他出仕归隐都不能如意的苦恼，但又始终象梅花那样坚贞独守：“见梅惊笑，问经年何处，收香藏白。似语如愁，却问我何苦红尘久客。……千林无伴，淡然独傲霜雪。”词的下片歌咏梅花“管领春回”而不争春色的高尚风格，以及不肯招蜂引蝶，孤标独立的纯洁本质。他用“寄陇程遥，和羹心在”表明自己忧国忧君的衷心。末句“东风寂寞，可怜谁为攀折”，叹息梅花的孤独不遇，也就是叹息自己空怀抱国之心而终无用武之地。这首词寄托遥深，几乎达到物我互化的境地，艺术性

是很高的。朱敦儒不但咏梅，还咏菊，咏莲，咏水仙，咏木樨……这些咏物词的共同艺术特点是都带有诗人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都是他自己品性、身世的寄托。因此，尽管敦儒前代或同时代的词人有不少歌咏同类事物的作品，而敦儒之作却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因为他是借各样的事物来表现他自身的。例如他咏桃的《卜算子》“灼灼一枝桃，粉艳天然好，只被春风摆撼多，颜色凋零早。结子未为迟，悔恨随芳草。不下山来不出溪，待守刘郎老。”假如只从单纯的咏物来衡量，那么这首词可以说根本不能算是咏桃。敦儒把俗艳的桃花写得和高洁的梅花一个样儿了。这是因为诗人意不在咏桃，而在于借桃自喻，表现自己入仕不得志的懊恼与苦闷，当然也就“似‘桃’还似非‘桃’”了。

敦儒不仅借咏物言志，还以“游仙”词抒写怀抱。他的一些游仙之作，貌似飘逸，实则寄寓了内心深沉的痛苦。他有两首《聒龙谣》，一首写他“梦里暂辞尘宇”，去游历天官。诗人在奇妙的仙境中遨游，俯视人间，看到的却是“蜗战多少功名”，“蚁聚几回今古”，对照之下，心情不可能不是沉痛的，不可能不对黑暗的现实产生鄙弃的心理，他“宁肯放弃现实而取幻想与梦想”^⑬。另外一首《聒龙谣》，内容、情感大同小异，只是更明确地疾呼：“惊尘世，悔平生，叹万感千恨，谁怜深素。”感叹“群仙念我，好人间难住”，希望“手授丹经，指长生路”。敦儒不满现实，渴望超脱，“渴望寻找一条走出现实环境的道路”。

敦儒很善于驾驭语言，他很少用典，语言平易晓畅，却能表现很深的意境和十分生动的形象。比如他有一些起句，表现的意境相当阔大，而所用词语则很平常。象“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轮明月”〔《念奴娇》（月）〕，“枕海山横，凌江潮去，雉堞秋风残照”〔《苏武慢》（枕海山横）〕，“倚晴空，正三洲下叶，七泽收虹”〔《醉思仙》（淮阴与杨道孚）〕。从这些词句，人们可以看出敦儒很善于使用活跃有力的动词，以造成一种宏大的气势。敦儒善于用词，还表现在形容词的选择上。他常常反复使用同一的字，而在不同的词句中却表现出迥然相异的意趣。例如他题作“大热卧病，浸石种蒲，强作凉想”的《满江红》，有句说“水蕉供碧”，这一“碧”字，表现的是酷暑中偶得的清凉；《好事近》（春雨细如尘）“风约绣帘斜去，透窗纱寒碧”，这个“碧”字，却使人感受到早春的寒冷；《菩萨蛮》（芭蕉叶上秋风碧）中的“芭蕉叶上秋风碧”，以“碧”色状秋风，显示了初秋的飒爽。敦儒又很会选用最适于表现特定思想感情的字眼，贴切而传神。如《木兰花慢》（和师厚《和司马文季虏中作》）：“叹故苑花空，春游梦冷，万斛堆愁。”花不是飞、落、残、谢，而竟是“空”，这是因为故苑“锁胡尘，几经秋”，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不复存在了。故苑早已不能归去，春游的梦也早已不能再作，所以说“春游梦冷”。“空”字和“冷”字在这里包含了多少深意！再如，敦儒有一首《点绛唇》（淮海秋风），写与友人别离，结句说：“大江横绝，泪湿杯中月。”杯中本是酒，但如说“泪湿杯中酒”，则了无余味，一个“月”字不单点

明了分别的时间是在凄清的月夜，而且杯中映着月光，泪落杯中似乎沾湿了月影，这就把离别的愁苦放大和加深了，还创造出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境界。敦儒一些表现乡国之思的作品感情十分沉痛，但由于词中有意境极为阔大的句子，就使整首词的情调显得不是哀伤而是悲壮，如《减字木兰花》（刘郎已老）、《相见欢》（金陵城上西楼）等便是。敦儒还时常能别出心意地创造出一些动人的形象，使人感到出乎意外恰又正在意中。比如他写梅花欲放，说“乍开绛萼欲生香，略绽粉苞先有意”；写初露的月光，说“素娥新练就，飞霜凝雪”；写好友暂别，说“二翁原是一溪云，暂为山北山南雨”……这种种描写都使人有“匪夷所思”的新鲜感。他咏梅的警句“横枝消瘦影如无，但风里空香数点”，宋张义端《贵耳集》评为“语意奇绝，如不食人间烟火语”。苏轼曾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即要求取物象的内在精神。朱敦儒正是深得梅花的神理，才写出了那样语意奇绝的佳句，充分地表现了梅花的空灵美。

总而言之，敦儒词不但在思想内容方面有很多可取之处，艺术上也有独到的成就。我们认为，朱敦儒在南宋爱国词人中应该占有一席不容忽视的地位。与他同时向来被称作爱国词人的叶梦得、陈与义、向子諲等，都曾身居要职，可是他们在词章中所表现的爱国热情，并不如敦儒所表现的那样深广，艺术上也显然比不上他。一些文学史和词选，不肯定或不敢明确肯定朱敦儒为南宋爱国词人中重要的一员，多半是囿于《宋史》本传那几句含糊的判词，误认为敦儒是“桧党”，

是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没有进一步深入研究他的生平、所处的历史社会条件以及他的全部词作。我们应当为他说句公道话。

这本《樵歌注》以文学古籍刊行社一九五八年版《樵歌》(龙元亮校本)为底本，重新进行核校，并参考《全宋词》，对个别地方作了一些订补。注释力求雅俗共赏，除注释难字难词、典故出处外，又对难句或进行串解，或概述大义。对一些比较重要的作品还作了简要的说明，或点明词旨，或说明时地，或略举特色，供读者参考。注释的体例是以句逗为单位，句中见词，详前略后。

《樵歌》向无注本，本书实属草创，限于学力，困难实多，因此，对某些我们感到没有把握的词语、典故宁肯阙如。《樵歌》中涉及许多人物，多是敦儒友人或平民歌伎等，名不见史传，也无从注释，希读者鉴谅。

《樵歌》传本均依词调排次，向无编年。由于史书记载朱敦儒的生平事迹过于简略，而他的词注明写作时间、地点的又寥寥可数，确实也很难为之编年。然而，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朱敦儒思想发展与创作道路，我们仍大胆地作了一些尝试，将朱词大体分为早、中、晚三期，各期内部又依我们对内容、思想的理解，大略地排成次序。三期词作的划分，我们自认为是较有把握的，因为我们相信自己已经大体理清了敦儒生平、思想的基本脉络，而他的三期词作(特别是早期、南渡至粤西时期、致仕后三段)，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语言风

格都有相当明显的区别，也还有少部分注明时地的词可以作为分期对比的依据。困难的是：北上临安到致仕前作品如何排次，中晚期之交作品的具体分界线应划在哪两首之间，晚期一般作品（无明显特点的作品）的次第安排等不易确定。书中谬误不当之处一定不少，望专家、读者给以指正。

本书注释和前言的初稿，曾得到一些前辈专家的指点，恕不一一列举，谨致谢意。

〔附注〕

①戈载《词林正韵·发凡》：“词始于唐，唐时别无词韵之书。宋朱希真尝拟应制词韵十六条，而外列入声韵四部。其后张辑释之，冯取洽增之。至元陶宗仪，曾讥其淆混，欲为改定，而其书久佚，目亦无自考矣。”

②朱敦儒生年史无明文，据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云：“敦儒跋唐太宗赐王元嘉《兰亭帖》，自云绍兴十六年时年六十六，以此推之，当生于元丰四年。”又据敦儒词《洞仙歌》云：“今年生日，庆一百省岁，喜趁烧灯作欢会。”《如梦令》云：“好笑山翁年纪，不觉七十有四。生日近元宵，占早烧灯欢会。”可知敦儒生日当在元宵节前夕，即正月十三或十四日，而且至少活了七十五岁以上。

③上面几段引文俱见《宋史·朱敦儒传》。

④敦儒词有题为“淮阴与杨道孚”，“淮阴作”、“金

陵”、“康州泊船”、“岭南作”者，可寻见其行踪。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谓敦儒“靖康乱离，避地自江西走二广”。又，其《相见欢》谓“泷州几番清秋”，可见他在泷州至少居住了两年以上；泷州在粤西山区，今广东罗定一带。

⑤据宋史本传，建炎二年，淮西部使者荐“敦儒有文武才”，召之，未应；绍兴三年广西宣谕使又荐敦儒“深达治体，有文武全才”，再召之，敦儒乃应召至临安。又，敦儒此时期词中不止一次表示要有所作为，为复土中兴出一番力。如《沙塞子》谓：“莫作楚囚相泣，倾银汉，洗瑶池，还尽人间桃李拂衣归。”

⑥绍兴六年，敦儒兼兵部郎中，九年四月以左宣教郎临安府通判为秘书郎，五月为都官员外郎，十四年为两浙东路提点刑狱。

⑦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⑧关于敦儒晚节问题，我们有《朱敦儒及其〈樵歌〉》一文详细论述，限于篇幅，这里无法作更多的说明。

⑨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二十九年春正月甲申（二十九日），左朝奉郎致仕朱敦儒卒于秀州（嘉兴）。”

⑩《别林斯基论文学》。

⑪恩格斯《爱尔兰歌曲集代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574页）。

⑫《尚书·说命》“若作和羹，惟尔盐梅。”后借以比喻臣子辅佐君主。

⑬高尔基语。转引自《俄国文学史》。

目 录

前 言	(1)
-----	-------

早期词作 南渡前(—1126年)

望海潮	丁酉，西内成，乡人请作望幸曲 (嵩高维岳).....	(3)
满庭芳	(花满金盆).....	(5)
菩萨蛮	(风流才子倾城色).....	(6)
定风波	(红药花前欲送春).....	(7)
春晓曲	(西楼落月鸡声急).....	(9)
杏花天	(挂帘等月阑干曲).....	(9)
杏花天	(听蝉剪叶迎秋燕).....	(10)
桃源忆故人	(玉笙吹彻清商后).....	(11)
桃源忆故人	(雨斜风横香成阵).....	(12)
浣溪沙	(碧玉阑干白玉人).....	(12)
浣溪沙	(才子佳人相见难).....	(13)
清平乐	(多寒易雨).....	(14)
清平乐	(春寒雨妥).....	(15)
好事近	(春雨细如尘).....	(15)
行香子	(宝篆香沉).....	(16)